

*"The only convincing love story
of our century"*

—Vanity Fair

*"Lolita is an authentic work of art
which compels our immediate response and
serious reflection — a revealing and
indispensable comedy of horro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洛
洛

丽

塔

LOLITA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精选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洛丽塔

H319.4

2W124

二 十 世 纪 外 国 文 学 精 选

LOLITA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H319.4/2W124

(京)新登字 155 号

京权图字: 01-1999-18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丽塔/(美)纳博科夫(Nabakov, V.)著.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9

ISBN 7-5600-2023-2

I. 洛… II. 纳… III. 英语-读物, 小说 IV. H319.4:I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8683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LOLITA by Vladimir Nabakov.

Copyright © 1955 by Vladimir Nabakov. Copyright renewed 1983 by Vera Nabakov and Dmitri Nabakov.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Inc.

洛丽塔

(美) Vladimir Nabakov 著

* * *

责任编辑: 赵东泓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75

版 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2023-2/H·1090

定 价: 13.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前言

于晓丹 廖世奇

“我承认自己不相信时间,我喜欢把我的魔毯用完叠起后,让它的图案的一部分叠印在另一部分之上。”

纳博科夫:《诉说吧,回忆》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旧式俄历 1899 年 4 月 10 日。如果换成西历,应该是 4 月 22 日。他一周岁时,正好是二十世纪新千年的开始,这一年因为旧式俄历较西历晚了一天,所以纳博科夫的周岁生日就成了西历 4 月 23 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天正是备受他推崇的莎士比亚的生日。

纳博科夫家世相当显赫,他的祖父曾是两代沙皇的司法大臣,家里既有钱又有文化,而且还属亲英一派。纳博科夫幼年受过的教育一般人根本望尘莫及。他小的时候,家里走马灯似的为他请了许多家庭教师,而他凭借天资聪慧,很小就掌握了英语、法语和德语。据说,他在会写俄文前就先学会了写英文。七岁时,他开始迷上了蝴蝶,收集蝴蝶标本的嗜好陪伴了他的一生,而且后来做得相当专业,还发表过几篇有关蝴蝶的昆虫学论文,使得他以作家成名之后,还常常被冠以“昆虫学家”的称号。纳博科夫有一位酷爱文学的父亲,也许是遗传的作用,纳博科夫很早就与文学结下了难解之缘。他最初的创作兴趣是写诗,十五岁上出版第一本诗集,三年后出版第二本,被当时舆论誉为“神童”。他一生写下的诗实在不算少,而且自视不低,但他的诗名却一直不怎么响亮。不过,他后来许多小说行文中那种醉人的诗意恐怕也得部分归功于他写诗

的努力吧。

纳博科夫曾把自己离开俄罗斯前的二十年光阴说成是一段“十全十美的过去”。父母的宠爱,无忧无虑地读书,写诗,捉蝴蝶,旅游,度假,甘涩交织的初恋,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温暖的痕迹。但这段“过去”恰恰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动荡血腥的年代。纳博科夫的一位评论者曾说纳博科夫的家世为他观察俄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拳击场边的位子”。话虽是不错,但有意思的是,就在俄国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纳博科夫却并没有到场,而且似乎很有些恶作剧地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事实上对任何大众化政治运动的冷漠是纳博科夫从为人到为文始终如一的禀性。这一点显然不是得自他父亲的遗传。作为立宪派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纳博科夫的父亲是当时政坛上的活跃人物。1917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将皇位让给自己的兄弟,却遭到拒绝,拒位诏书就出自纳博科夫父亲之手,也正是这份诏书正式宣告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终结。十月革命爆发后,纳博科夫的父亲把家人送到克里米亚避险,自己留在彼得堡,企图推动西方式的立宪大会选举和苏维埃唱对台戏,因此被列宁下令逮捕,获释后也去了克里米亚。1919年,苏联红军攻入克里米亚,纳博科夫全家仓皇出逃,流亡德国。纳博科夫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到柏林后不久,靠变卖母亲的首饰,纳博科夫得以赴英国进入剑桥大学就读,主修法、俄文学。就在他毕业前不久,他父亲在一次政治集会上为保护演讲者遇害身亡。这件事对纳博科夫的刺激极深,不少论者认为他日后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血腥恐怖,与他父亲的死有很大关系。

大学毕业后,纳博科夫回柏林陪伴母亲。他先是在一家银行谋到一份工作,但在办公室只坐了三个小时便觉得无聊透顶,决心辞职,回家专心写作。手头拮据时,他就以教授拳击、网球、英语和法语为业。他用“V. SIRIN”的笔名在俄国流亡者报刊上发表数量惊人的诗歌、小说和杂文,声誉渐起。1926年,纳博科夫发表第一

部长篇小说《玛申卡》，即有评论把他称为“新一代最伟大的希望”。在以后的十四年中，纳博科夫又出版了十部长篇、五十多个中短篇、四个剧本以及一百多首诗歌。

1937年，希特勒任命新的柏林俄罗斯侨民事物主管，此人却正是参与杀害纳博科夫父亲的凶手。纳博科夫只得携家出逃，流亡巴黎。尽管当时他声誉日隆，但这声誉主要还是局限在俄国侨民文学界，因此法国当局对他并不热情，甚至拒绝发给他工作许可。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前夕，他的犹太裔妻子得到纽约犹太人救济组织的帮助，全家得以移民美国。

到美国后，他先是在著名的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谋到一份教俄罗斯文学和俄语的差事，其间还曾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任研究员，从事从小就令他十分着迷的鳞翅目昆虫的研究。1948年起，他被康奈尔大学聘为教授，教俄罗斯文学和欧洲小说。纳博科夫不是正规学者出身，但他满不在乎，反而以攻击正统文学观为乐。他的有些观点相当别致。他毫不讳言地告诉学生说，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和童话一样虚假，对主人公的冷嘲热讽残忍得令人厌恶，相比之下，常受人诟病的狄更斯式的多愁善感倒成了现代人文明进步的标志。据说他曾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撕掉过一本《堂·吉珂德》。他对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也表示不屑一顾，把《罪与罚》说成是“二流的侦探故事”。纳博科夫的讲课和演讲稿在他去世后结集成两卷本的《文学讲稿》、《俄罗斯文学讲稿》和《关于堂·吉珂德的讲稿》出版。纳博科夫在学术上最引入注目的成就恐怕要算他翻译的普希金的《奥涅金》。直到今天，他那洋洋洒洒的四大卷译本仍然被公认为是《奥涅金》的最忠实的英译本，而他为译本提供的上千页的注释不仅为读者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普希金创作《奥涅金》的语境，而且也充分显示了译者惊人的博学。

纳博科夫的讲课极受学生的欢迎，但他却曾明言自己讨厌教书。最让他动心的仍然是写作和捉蝴蝶。纳博科夫是在移民美国前夕才开始尝试以英语写作。尽管他从小学过英语，但从未用英

语进行过文学创作。已过不惑的纳博科夫何以能如此迅速地写出独树一帜的优美英语,实在是只有天知道。到美国的第二年,即1941年,纳博科夫出版他用英语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塞巴斯蒂安骑士的真实生活》,从此确立了他对自己用英语创作的自信,也赢得了诸如埃德蒙·威尔逊那样的大牌批评家的敬意。此外,他还在《纽约人》、《大西洋月刊》等顶级刊物上发表了大量诗歌、小说和散文,被美国文学评论界公认为最出色的美国作家之一。不过,真正为纳博科夫赢得公众广泛瞩目的作品还是《洛丽塔》。

《洛丽塔》的巨大成功,很有点儿功高盖主的味道。读者识得纳博科夫大多都只是因为他的《洛丽塔》,他后来出版或再版的作品也都得挂上“《洛丽塔》作者”的招牌。《洛丽塔》不仅为纳博科夫赢来了空前的盛名,而且也让他着实发了一笔横财,总算让他有机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尽管康奈尔大学很想留住这位已然成为文化明星的教授,但纳博科夫却再也没有回校园教书、改作业的心思了。1959年,纳博科夫离开美国,移居欧洲,1961年定居瑞士,直到1977年7月2日去世。

《洛丽塔》之后,纳博科夫继续以英语创作发表了《普宁》、《微暗的火》等四部长篇和一篇题为《透明的事物》的中篇,并扩充和修订了记述他移民美国前生活的自传《诉说吧,记忆》,其中成就最高的无疑是《微暗的火》。纳博科夫在这部作品中,巧妙地通过对一首诗作详尽无遗的注解来表现作品人物的错综复杂的传奇经历。这部作品充分显示了作者在语言、文体和构思布局上的全面才华,其中的双关语、多义词、隐喻、暗示俯拾即是,文字典故更是数不胜数,为这些典故甚至完全可以另作一部“注解”。纳博科夫那种欲擒故纵、游刃有余地驾驭寓言式小说的才能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微暗的火》知名度虽然远不如《洛丽塔》,但如果纯粹就形式而言,它的成就恐怕还在《洛丽塔》之上,甚至有人断言,它是自有小说以来,形式最完美的一部。它常常和《洛丽塔》一起被认为是纳博科夫所有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

两部经典杰作。

在纳博科夫刚到美国的行李中，有一部用俄语创作的中篇小说稿，题为“迷魂者”，写的是一个中年的中欧男人爱上并企图诱惑一名法国少女的故事。据纳博科夫自己回忆说，他是1939到1940年间读了一篇有关一只类人猿经过科学家多年训导终于用碳笔画出第一张素描的报道后，突发灵感，写下这篇小说的。他曾把这篇小说念给自己的几个朋友听，但从未想过拿去发表，倒不是觉得因为题材犯忌，而是他自己认为小说中的少女写得太虚，太没有自己的声音。这篇小说直到纳博科夫逝世后，才由他的儿子翻译成英文出版。

纳博科夫1947年写给好友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正在写一部名叫《海滨王国》的短篇小说，也是有关一个有恋少女癖的男人的故事。但由于要教书维持生计，他很难挤出时间专心写作。从1949年到1954年，纳博科夫每年夏天都要和妻子开车到山野中捕捉蝴蝶，晚上或遇上阴天下雨，他就在汽车旅馆里写他的《洛丽塔》。事实上，《洛丽塔》与作者对蝴蝶的着迷有不少关联。不仅《洛丽塔》所再现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纳博科夫捉蝴蝶的旅途上所观察到的“美国”，就连洛丽塔的形象本身似乎也能考证出不少蝴蝶的影子。难怪后来有关纳博科夫的许多漫画，都爱在他浑圆光亮的大脑袋旁或画上一只蝴蝶，或画上一只捕蝶网。

纳博科夫曾很认真地说《洛丽塔》的故事“极其道德”，但在1954年春天《洛丽塔》刚完稿时，他对读者能否看出其中的道德品质却毫无信心。由于当时纳博科夫的经济状况仍显窘迫，他很担心自己会受《洛丽塔》的牵累而丢掉在康奈尔大学的饭碗，因此千方百计不想在书上署上真名。但后来又怕一旦被发现，更会给批评者留下话柄，这才改变初衷。纳博科夫把小说先后投寄给四家美国出版商，但都遭到拒绝。有的觉得这部小说的“色情”主题处理得实在不够“色情”。有的为书中一个好人也没有而深感遗憾，还有的居然建议纳博科夫把“洛丽塔”换成一个十来岁的少男，把

亨伯特变成一个农民,让后者在谷仓里诱奸前者,似乎这样一来,就能给作者和出版商增加点道德上的安全感,其中的逻辑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洛丽塔》在美国碰壁后,纳博科夫只好拿它到欧洲去试运气。1955年,巴黎的奥林比亚书局以英语出版了《洛丽塔》。这家出版社曾因出版过塞缪尔·贝克特、让·热奈等争议作家的作品而在知识界享有一定的声望。不过,纳博科夫并不知道奥林比亚书局当时还出版了一套绿色包装的色情小说丛书,而他心爱的《洛丽塔》正是以同样的包装,分上、下两卷出版的。《洛丽塔》无声无息地与《罗宾逊的性生活》、《直到她叫春》一类的色情读物做了差不多六个月的伴,多亏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慧眼识珠,将它封为该年度最佳小说之一,这才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格林的褒扬立刻招来了反对者愤怒的抗议,而格林也毫不客气地还以颜色。这场争执很快也引起美国文学界的关注,《洛丽塔》随之开始在美国圈内流传。

为了防止越来越多的旅游者把奥林比亚书局版的《洛丽塔》带入英国,英国政府于1956年底要求法国政府查禁该书。法国政府虽说在书刊检查制度上向来以开明自居,但对正在苏伊士运河并肩作战的盟友的要求却不敢怠慢,因此先后两次下令查禁《洛丽塔》,美国政府的行动却远没有这么激烈。美国海关两次查没了旅游者携带的法国版《洛丽塔》,但不久都予以放行。从法律上讲,美国政府似乎已承认该书不在查禁之列。但小心翼翼的纳博科夫和他的美国出版商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它们先是在文学批评刊物《铁锚评论》上以100多页的篇幅刊登《洛丽塔》的节录、一篇学术味道十足的导言和纳博科夫的后记“谈一本题为《洛丽塔》的书”,以便从学术上确立《洛丽塔》作为严肃文学作品的地位,为日后可能引发的官司准备论据。1958年,美国普特南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洛丽塔》美国版。

《洛丽塔》虽然在美国并没有像作者和出版商担心的那样惹上

官司,但还是不出意料地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支持者将《洛丽塔》奉为敢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争辉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而反对者则一致拿作品的道德感开刀,斥之为“高级色情”。这类争议在任何时候好象都是作品最好的广告,《洛丽塔》自然也不例外。对立双方吵翻了天,《洛丽塔》的销量也青云直上,上市头三周就卖出十万本,平了《飘》的纪录。某市公立图书馆传出禁止出借《洛丽塔》的消息,《洛丽塔》没过几天便顺势窜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单的头榜,纳博科夫随之也成了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对这新来的巨大声誉,纳博科夫表现得心安理得,自以为名副其实,只抱怨“来晚了三十年”。他的太太对此似乎比他看得更实在一些。尽管她从未怀疑过丈夫的天才和伟大,但她还是表示若不是《洛丽塔》,这一切至少要等五十年。

然而,令纳博科夫颇感气馁的是,《洛丽塔》的这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给作品本身套上了当初法国版所具有的“色情”包装。为了不让他心爱的《洛丽塔》被商业炒作过分庸俗化,他曾要求他的出版商不在封面上使用少女的形象,甚至在出售作品的电影版权时,坚持反对用真的女孩饰演“洛丽塔”的角色,而建议用女侏儒替代。纳博科夫的这些努力究竟有多少成效实在是大可怀疑,问题是,既然现实中的纳博科夫不希望有关《洛丽塔》道德感的争议影响读者的期待,那么,纳博科夫在作品中又是如何设置这种期待的呢?

纳博科夫曾经一再抱怨他的批评者被故事表面的色情意味误导了。这恐怕只说对了一半。毫无疑问,许多人的阅读动机可能确实出于要看看《洛丽塔》到底有多“不道德”。不过,稍有耐心的读者不出几页,便可以充分的理由怀疑自己是否受了商业炒作的蒙骗。但话说回来,没有人,包括纳博科夫自己,会认为中年男子痴恋十三岁少女的故事本身是“道德”的。问题在于,《洛丽塔》的“不道德”并非一般读者习惯上期待的那一种。道学士或许会觉得它低级下流,令人作呕,但猎奇者恐怕就会大失所望。

所谓“不道德”的艺术在西方可谓源远流长，而性爱色情则是其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主题。《洛丽塔》虽说不乏性的描写，可行文似乎总带有一股子令人气馁的“性冷淡”。它既没有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那种细腻撩人的感官快感，也没有乔伊斯《尤利西斯》里那种满不在乎的猥亵。或许人们已经习惯将《尤利西斯》中的色情段落看作是艺术无拘无束的纯粹性的证明，但纳博科夫坚决认为那是他极为推崇的现代大师的最大败笔。

在《洛丽塔》的“小引”里，纳博科夫特意说明亨伯特的独白出奇得干净，绝无一般色情小说使用的下流的陈词滥调。他对色情本身不感兴趣，对以色情来证明艺术的自由似乎也并不关心，因为后者对他来说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如人们通常所说的“色情”不一定就是“不道德”，“不道德”也不一定就是“色情”。以为彼此相当，因而大呼上当的读者恐怕只能怪罪自己。但这并不是《洛丽塔》争议的关键，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纳博科夫对道德问题本身也显得缺乏兴趣。纳博科夫当然明白亨伯特痴恋洛丽塔会触动社会的道德神经，但他始终不想追究亨伯特暧昧行为的社会内涵和道德后果，这使他区别于《安娜·卡列尼娜》的托尔斯泰和《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纳博科夫既没有挑战社会道德规范的雄心大志，也没有普渡欲海众生的情怀，没有批判和嘲讽，也没有感伤和警喻。他讨厌任何有关他小说是不是道德的提问。在《洛丽塔》的世界里，艺术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是在道德之外的。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似乎还不如他笔下疯疯癫癫的亨伯特有道德感。亨伯特即使是在全神贯注地捕捉最销魂夺魄的欲望细节时，也不时扯进令他倍感煎熬的道德困惑。纳博科夫对此如何解释呢？很简单，亨伯特是亨伯特，纳博科夫是纳博科夫。他说，“深感亨伯特同洛丽塔的关系不道德的不是我，而是亨伯特自己。他关心这一点，而我不。”纳博科夫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亨伯特同洛丽塔的关系是道德的，而是说这个问题与他的小说艺术毫不相干。不是对立，而是无关。

但这实在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无关”。既然纳博科夫明明知道故事本身在道德上的挑衅性,明明知道让一个性变态者喋喋不休地追述自己欲望历程的所有细枝末节只会更深地刺激读者的道德神经,为什么又要读者绝对不要追问任何道德问题呢?这种艺术姿态高得岂不有点儿蛮不讲理?

其实,在纳博科夫看来,这正是对读者最好的调侃。他决心要在最容易引起道德追问的地方使道德变成一个最显而易见而又最问不出名堂的问题。尽管亨伯特偶尔也会引经据典进行狡辩,但并不真的挑剔道德约束的当与不当,不为自己的行为在道德上寻找辩解的理由。对他来说,自己行为的不道德根本就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再去纠缠行为的道德含义实在是多此一举。我们可以厌恶他,却无法同他对话。亨伯特的世界始终是一个独白的世界,没有激情的辩论,只有无聊得令人绝望的口角。他展示给我们的的是一个单调反复、琐碎芜杂的主观图景,推动情节发展的行为过程仅仅是这个图景虚化的轮廓。他只求我们有全世界的耐心来聆听他被欲望烧灼的伤心史,包括一切飘忽不定、支离破碎的情感细节。纳博科夫知道读者不会轻易放弃固有的道德诉求,因而在叙事中预先把这种诉求变得如此绝对,如此不可怀疑,以至于在亨伯特自甘堕落的阴暗角落里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供讨论的问题,而只能被当作一个纯粹是没有任何叙事意义的既成事实。纳博科夫在“引子”中说亨伯特的忏悔独白有着宝贵的病理和伦理学价值,但似乎没有比这更具讽刺意味的了。事实上,我们要是真的去寻求这种价值的话,就永远会被屏斥在《洛丽塔》的世界之外。

作为作家,纳博科夫对道德问题如此地不屑,对所谓“真实性”或“现实”的问题也没有太多耐心。他曾把创作比喻为编造“狼来了”的谎言,常规意义上的“真实性”简直就象最后吃了说谎的小孩的大灰狼一样让他讨厌。《洛丽塔》其实在“真实性”的问题上是纳博科夫多产的创作中十分独特的一部小说,其描写给人的印象最接近经典现实主义的那种“逼真感”。《洛丽塔》最令人叹服的成就

之一就是,作为一个移民作家的纳博科夫比绝大多数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更逼真地创造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风景。但这种“逼真感”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必不可少的自然背景,并没有给亨伯特的欲望世界赋予任何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感。纳博科夫始终是一个醉心于操纵幻觉的魔术师。他说一切所谓的“真实”或“现实”不过是面具而已,并建议把这个词永远放在引号里。事实上,拷问《洛丽塔》叙事的“真实性”就如同拷问它的道德感一样令人气馁。

除了简短的“引子”外,《洛丽塔》通篇都是亨伯特滔滔不绝的第一人称独白。但第一人称叙述通常就象无法佐证的一面之辞,并非绝对可靠。读者一方面没有理由完全信任“我”的诚实,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更为可靠的客观依据。尽管亨伯特在道德的审判庭上始终显得唯唯诺诺,毫无挑战者的倔强和勇气,却也演出了一场似是而非、真伪难辨的滑稽戏。比方说,亨伯特如此心甘情愿地接受所有现成的社会道德的谴责,使得我们难以确定他那些看似负疚的忏悔到底有几分真诚。他是认真的,还只是说给道德感崇高的读者听的,或者是在对常规的忏悔文体进行模仿。我们知道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向来表示不屑,但他偏让亨伯特一脸真诚地追述自己恋女童癖的根源、变态行为的动机以及被压抑的童年性经验等,仿佛我们读者是一群训练有素的弗洛伊德信徒。纳博科夫不仅想让我们看看亨伯特的滑稽,似乎也想看看我们读者的滑稽。在他眼里,企图通过解读性象征对亨伯特作联想法治疗的读者可能比只想把亨伯特打入地狱的道学家更加可笑。

纳博科夫刻意营造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含混性令很多志在挖掘意义的阐释家感到无所适从。一位论者自觉找到了被这种含混性掩埋了的真义,称《洛丽塔》是“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的象征,但另一位论者却在同样的地方有了别的发现:《洛丽塔》“是年少的美国诱奸衰老的欧洲”的寓言。纳博科夫劝读者不要在他的作品里寻找象征或寓言,滑稽模仿带来的含混性并不掩盖什么,它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精神,是通向纳博科夫所谓的“严肃情感的最

高境界”的跳板。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弗雷德·阿贝尔曾这样评论纳博科夫:如果说“诗是想象的花园,但其中却有真的蛤蟆,那么,纳博科夫的诗就是对死亡的滑稽模仿,但其中却有真实的痛苦。”就风格而言,《洛丽塔》具有显而易见的喜剧性,甚至还有不少露骨的闹剧成份,但它始终也渲染着沉重的悲剧色彩。作为读者,我们很可怀疑亨伯特的道德忏悔究竟有几分真诚,但对于纳博科夫所赋予他的优美凄绝的情感告白,又有谁不会为之动容呢?事实上,许多《洛丽塔》的辩护者都因为难以自禁为亨伯特的痛苦所感动,误以为纳博科夫的意图是要为恋少女癖赢得社会的同情和宽容,而它的批评者也大都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感到恼羞成怒。然而,纳博科夫绝不是托尔斯泰或福楼拜,《洛丽塔》所关注的也绝不仅仅是恋少女癖。亨伯特确实说过“要一劳永逸地确定小仙女危险的魔力何在”的话,但我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怀疑他最后的一段话不是认真的:“我正在想欧洲的野牛和天使,在想永不褪色的颜料的秘密,预言家的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这便是你与我能共享的惟一的永恒,我的洛丽塔。”

和纳博科夫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亨伯特是一个化了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艺术家的。他禀性敏感,想象力丰富,但近于偏执。他在小说中曾引用一位诗人的话说,“人性中的道德感是一种义务,而我们则必须赋予灵魂以美感。”当然,在《洛丽塔》中,这种所谓的“美感”既有艺术华丽的诗意,也充满了性堕落者阴暗的罪恶感。作为他的欲望对象,洛丽塔只不过是亨伯特意识的产物,是他异想天开地企图从外部的现实和时间中抢夺出来的一个幻象。亨伯特对此自己也是心知肚明:“我疯狂占有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造物,是另一个,梦想中的洛丽塔——或许比洛丽塔更真实;……的确,她自己是没有生命的。”亨伯特的残忍就在于他不仅让自己陶醉于自己创造的梦幻现实中,而且诱使洛丽塔成为他为她创造的意象。和他的创造者纳博科夫一样,亨伯特不相信时间,甚至满

怀恐惧。他害怕洛丽塔生长,梦想她永远只是自己欲望世界中的一个不变的动人图案。

尽管说亨伯特的忏悔在道德上从头到尾难免狡辩和滑头的嫌疑,但他对作为自己梦幻意像的“洛丽塔”倒始终是一片真诚。甚至当洛丽塔的真身最后变成大腹便便、憔悴瘦削的孕妇时,亨伯特竟依然恳求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不少《洛丽塔》的辩护者以此作为亨伯特道德感悟的明证,恐怕过于一厢情愿了。就在万念俱灰的亨伯特杀了奎尔蒂、在悬崖上聆听山下小镇孩子们的欢闹时,他终于明白“那刺痛心肺、令人绝望的东西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身边了,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和声里了。”亨伯特的这段告白曾被誉为二十世纪文学中最优美动人的抒情文字,但我们在为之唏嘘感慨的时候,不要忘了亨伯特痛悔失去的东西对于洛丽塔本人却是最残忍不过的了:那是对她的生命成长的扼杀。

如果艺术真的是人类向时间争取永恒的尝试的话,那么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痴恋恐怕是最疯狂的一种尝试了。痴情却又残忍,悲壮却又可笑。作为他的创造者,纳博科夫在作品中既没有悲天悯人的慈悲心怀,也没有嫉恶如仇的道德正义感。他相信在简单的同情和厌恶之外还有更高的“严肃情感的境界”。至于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则是对《洛丽塔》的读者的最大挑战。

2000年6月18日于纽约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Like the sweat of lust and guilt, the sweat of death trickles through *Lolita*. I wonder how many readers survive the novel without realizing that its heroine is, so to speak, dead on arrival, like her child. Their brief obituaries are tucked away in the 'editor's' Foreword, in nonchalant, school-newsletter form:

'Mona Dahl' is a student in Paris. 'Rita' has recently married the proprietor of a hotel in Florida. Mrs 'Richard F. Schiller' died in childbed, giving birth to a stillborn girl, on Christmas Day 1952, in Gray Star, a settlement in the remotest Northwest. 'Vivian Darkbloom' has written a biography ...

Then, once the book begins, Humbert's childhood love Annabel dies, at thirteen (typhus), and his first wife Valeria dies (also in childbirth), and his second wife Charlotte dies ('a bad accident' – though of course this death is structural), and Charlotte's friend Jean Farlow dies at thirty-three (cancer), and Lolita's young seducer Charlie Holmes dies (Korea), and her old seducer Quilty dies (murder: another structural exit). And then Humbert dies (coronary thrombosis). And then Lolita dies. And her daughter dies. In a sense *Lolita* is too great for its own good. It rushes up on the reader like a recreational drug more powerful than any yet discovered or devised. In common with its narrator, it is both irresistible and unforgivable. And yet it all works out. I shall point the way to what I take to be its livid and juddering heart – which is itself in pre-thrombotic turmoil, all heaves and lifts and thrills.

Without apeing the explicatory style of Nabokov's famous Lectures (without producing height-charts, road maps, motel bookmatches, and so on), it might still be as well to establish what actually happens in *Lolita*: morally. How bad is all this – on paper, anyway? Although he distances himself with customary hauteur from the world of 'coal sheds and alleyways', of panting maniacs and howling policemen, Humbert Humbert is without question an honest-to-God, open-and-shut

LOLITA

sexual deviant, displaying classic ruthlessness, guile and (above all) attention to detail. He parks the car at the gates of schoolyards, for instance, and obliges Lo to fondle him as the children emerge. Sixty-five cents secures a similar caress in her classroom, while Humbert admires a platinum classmate. Fellatio prices peak at four dollars a session before Humbert brings rates down 'drastically by having her earn the hard and nauseous way permiss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school's theatrical programme'. On the other hand he performs complementary cunnilingus when his stepdaughter is laid low by fever: 'I could not resist the exquisite caloricity of unexpected delights – Venus febriculosa – though it was a very languid Lolita that moaned and coughed and shivered in my embrace.'

Humbert was evidently something of a bourgeois sadist with his first wife, Valeria. He fantasized about 'slapping her breasts out of alignment' or 'putting on [his] mountain boots and taking a running kick at her rump' but in reality confined himself to 'twisting fat Valechka's brittle wrist (the one she had fallen upon from a bicycle)' and saying, 'Look here, you fat fool, *c'est moi qui décide*.' The weakened wrist is good: sadists know all about weakspots. Humbert strikes Lolita only once ('a tremendous backhand cut'), during a jealous rage, otherwise making do with bribes, bullying, and three main threats – the rural fastness, the orphanage, the reformatory:

In plainer words, if we two are found out, you will be analys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my pet, *c'est tout*. You will dwell, my Lolita will dwell (come here, my brown flower) with thirty-nine other dopes in a dirty dormitory (no, allow me, please)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hideous matrons. This is the situation, this is the choice. Don't you think that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Dolores Haze had better stick to her old man?

It is true that Humbert goes on to commit murder: he kills his rival, Clare Quilty. And despite its awful comedy, and despite Quilty's worthlessness both as playwright and citizen, the deed is not denied its primal colorations. Quilty is Humbert's 'brother', after all, his secret sharer. Don't they have the same taste in wordplay and women? Don't they have the same voice? 'Drop that pistol,' he tells Humbert: '*Soyons raisonnables*.'